

# 存世清词别集总目著录问题考论<sup>\*</sup>

张仲谋

**内容提要** 《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见存书目》共著录清词别集 2382 家，词集版本信息 6276 条，是目前著录清词别集最多最全的专题目录。我们首先对清词别集的著录情况加以梳理总结，其次对清词别集的文本形态进行分类界定，尤其是对诗文别集附词的词别集认定给出了具体规定。在此基础上，对《知见目录》进行订补与整合，去掉误收词集 5 种、非严格意义清词别集 7 种、重复著录词集 5 种、兼收合集或丛编 63 种，再芟并不同版本信息 3009 条，可知《知见目录》实收清词别集 3187 种。关于《知见目录》未收的清词别集，根据目前辑补的情况，预计可补 500 种左右，存世清词别集当在 3700 种左右。

**关键词** 清词 别集 著录 《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见存书目》

吴熊和、严迪昌、林玫仪合编的《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见存书目》（以下简称《知见目录》）是迄今为止著录存世清词别集信息最全的目录。该目录共著录清词别集 2382 家，词集版本 6276 种。由于《知见目录》的性质属于版本目录，因此在这 6276 种词集版本信息中，除了清代常见的一人多集的因素之外，不同版本条目就有三千余种。林玫仪在《知见目录》卷首《缘起》中称“全书计收清词作者二千余家，别集资料六千余条”<sup>①</sup>，王兆鹏《词学史科学》称《知见目录》“共收罗海内外现存词别集作者 2382 家，词别集版本 6276 种”<sup>②</sup>，皆表明这里的 6276 种是清词别集版本条目之数而非清词别集之数。曾见有的词学论著称该书目录收录清词别集六千余种，应该是不准确的说法。比如该书中著录朱彝尊的词集 5 种，版本目录多达 77 种，当然不能据此认定朱氏有词集 77 种。从研究词籍版本流传的角度来看，版本目录是非常有用的，但它仍然不能代替词集目录。比如现在要问清代有多少种词别集，我们是回答不出来的。为了具体统计现存清词别集的数量，本文拟在《知见目录》基础上，进一步厘定清词别集的文本形态，一方面芟并版本因素，一方面拾遗补缺，希望能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将清词别集的清理著录再向前推进一步。

## 一 清词别集的著录情况

关于清词别集的清理著录，较早的成果有中国台湾地区王国昭编《现存清词别集汇目》（《书目季刊》1979 年第 3 期）。该书目录辑录清词别集 800 家，1100 多种，并注明版本与收藏单位。其卷首“凡例”之六云：“凡虽同系一书，然所题名不同或卷数有异，则分别著录。”这就意味着该目录具有版本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历代词籍总目提要与文献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 18ZDA25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清词编年史及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 17AZW007）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 吴熊和、严迪昌、林玫仪合编《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见存书目》“缘起”，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 1997 年版，第 XV 页。

<sup>②</sup> 王兆鹏《词学史科学》，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282 页。

目录的性质。如吴伟业《梅村词》，在《中国词学大辞典》中只出一目，即作为一种别集看待，对其不同版本则在著录文字中加以说明。而在《汇目》中，则因题名与卷数之异，分别著录为五种，其中包括清康熙刊《梅村集》附《梅村诗余》一卷，清康熙间留松阁刊《国朝名家诗余》本《梅村词》二卷，聂先、曾王孙《百名家词钞》本《梅村词》一卷，晚清湖北官书处刊本《梅村词》不分卷，董氏刊《诵芬室丛书》本《梅村诗余》二卷。实际若据此著录，《梅村词》还有其他题名或分卷有异的版本，如《知见目录》即著录有19种版本。《汇目》对大陆各地图书馆藏书未能寓目，故收录有限。据此亦可知其所收清词别集800家1100多种，其中多有同一词集多种版本的情况，而800家之数更具实际意义。

1996年，马兴荣、吴熊和、曹济平主编的《中国词学大辞典》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共著录历代词总集275种、别集905种、词话96种、词韵11种、词谱11种，合计著录各类词籍1298种。其中清词别集虽仅有256种，但其中除王鹏运、朱祖谋等数家或一人多集之外，其余大多是以家数系词集的，故清代知名词人的别集，大体完备。

1997年，《知见目录》出版。该书编者穷数年之力，旁搜远绍，著录清词别集达2382家，版本条目达6276种。其最难能可贵之处，是几乎遍访海内所有大中型图书馆，著名的私家藏书如李一氓、施蛰存、黄裳、谢伯阳、杜泽逊等，以及海外以收藏汉籍著称的藏书机构（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内阁文库、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等），皆进行悉心搜访。其有功学林、嘉惠后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吴熊和、严迪昌合撰之“前言”称：“存世之清词别集，本《目录汇编》大抵已得其十九则断可自信。”（第XVIII页）现在看来，“得其十九”虽未必做到，但其筚路蓝缕之功确实为我们后续的拾遗补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2000年，王绍曾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前的《清史稿·艺文志》和《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所著录的清代文献不足两万种，王绍曾、杜泽逊等历时十年完成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清人著述54000余种，其中著录清词别集即达1300余种。虽然这里所著录的各种书目是见于文献记载而未必保存至今的，但对于我们考察清代词籍源流，仍具有索引功能。

2004年，王兆鹏《词学史料学》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共著录词谱54种、词韵18种、词集丛编65种、词选132种、词话95种（另有待访词话52种），词别集包括唐五代25家、宋代338家、金元88家、明代253家（依赵尊岳《明词汇刊》而定），清代以前词别集约700种，合计著录历代词籍1064种。尽管作者“也曾搜集数千种清词别集版本目录，依词人姓氏拼音为序排列，编成《清词别集目录初编》”，但因为《知见目录》已经先此出版，所以只能“割爱从略”（《词学史料学》，第283页）。该书是新时期以来词学史料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词学目录学的功能，故在近二十年来的词学研究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7年，张宏生主编《全清词（雍乾卷）》之余，又推出了《清词珍本丛刊》（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这是继杨家骆编辑出版《清词别集百三十四种》（鼎文书局1976年版）之后的又一大型丛编。该丛书共收录清代词集320种，尤以别集为多。其中如梁云构《豹陵集诗余》《豹陵二集诗余》、仲恒《雪亭词》、赵执信《海鸥小谱》等，都是《知见目录》所未收的。其中多有过去难得一见的稿本、钞本和较早的刊本，因为版本难得，所以价值很高。

2012年，学界瞩目已久的《中国古籍总目》终于正式出版。该目录编纂团队集中了国内图书馆界、文献学界的众多专家，著录现存中国古籍十七万余种，为中国现存古籍的清理集成做出了极大努力，在为专家学者提供书目工具，为古籍同行提供交流平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因为面广量大，确实难于尽善尽美。按道理来讲，《中国古籍总目》“前言”称其“是现存中国汉文古籍的总目录”，那么其中的集部词类也应该是现存词籍之总目录。然而细读其书，并就词集、词话、词谱、词韵

各类书目与此前各书加以比对,却感到些许遗憾。从收录词籍总量来看,《中国古籍总目》“丛编之属”收录古籍93种,“别集之属”收录1966种,“总集之属”收录216种,“词谱之属”收录42种,“词韵之属”收录12种,“词话之属”收录75种,合计2404种。因为《中国古籍总目》是按版本著录,故其所收词籍数量就更加有限了,并没有超出《中国词学大辞典》和王兆鹏《词学史料学》的收录范围。以清词别集而论,《中国古籍总目》共收清词别集1165家,1574种;而《知见目录》所收清词别集为2382家,6276种。两相比照,多寡悬殊。因为《知见目录》在每种词集后都注明了藏书单位,除了海外及少数私家收藏之外,国内图书馆藏书查核起来极为方便。但从《中国古籍总目》的著录情况来看,《知见目录》似乎并没有进入编者的视野。若是看到了而有所筛选,我们也看不出取舍的标准是什么。虽然《中国古籍总目·集部》“前言”声称该书“吸收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sup>①</sup>,但从清词别集书目来看,编者对于近二三十年的词学研究成果,并没有充分吸收利用<sup>②</sup>。

## 二 清词别集的文本认定

一般来说,通行的词集或词籍目录可分为三种体例。其一是以版本为主,同一词集的不同版本皆各为一目,如《知见目录》和《中国古籍总目》。此种著录方式,虽无提要或叙录,但仍属传统的版本目录。其二是以家数为主,同一人词集,虽然题名、分卷有异,仍作一目,而将不同版本罗列于后。王兆鹏《词学史料学》及《中国词学大辞典》等皆属此类。就清代以前的词家而言,大多数词家只有一种词别集,虽然不同版本在题名、分卷、版式或笺注等方面有所变化,却仍可视作同一别集的不同版本。这种著录方式以词人为目,近乎传统的著者目录。其三是以词集为主,同一词人若有多种词集,皆各为一目;同一词集若有多种版本,则于词集下分先后罗列,而不另列条目。此种著录方式,便于揭示词集的历史面貌。本文统计现存清词别集书目即拟采取第三种体例。

伴随着清词的发展与繁荣,清词别集的文本形态也表现出迥异于前代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词别集和总集、家集、合集、唱和集、选本等往往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同一词人的词别集和诗文别集之间也有着种种复杂的连带关系。因此,必须先对词别集的概念作出严格界定,然后才能对词别集进行认定与统计。根据清词别集的实际情况,拟就以下四种情况作出裁定。

### (一) 一人多集与一集多本

在唐宋金元时期,一个词人都只有一种词别集,同一词集的不同版本则另当别论。如柳永有《乐章集》,苏轼有《东坡乐府》,周邦彦有《片玉集》之类。不同版本的集名、卷数及收词情况有异,属于同一词集的不同版本系统。至明代瞿佑既有《乐府遗音》又有《余清词》,杨慎《升庵长短句》有正集三卷、续集三卷,遂开一人多集之先河。到清代,词人创作丰富,又喜花样翻新,一人词集可多至七八种。对于这种情况,试作三种规定:

1. 一人多集者,每集自为一种。如汪森词集有《月河词》《桐扣词》各一卷,聂先、曾王孙辑《百家家词》又收录其《碧巢词》一卷,则三集各为一种。楼俨有《北骊词》一卷、《叩拙词》一卷、《朝天初集》附词一卷、《蓑笠轩词》一卷、《戴月吟》附词一卷,共为五种。

2. 一人多集且有合编词集者,各小集与合集自为一种。如朱彝尊词集,先后有康熙六年(1667)刻《静志居琴趣》一卷。康熙十七年(1678)柯维祯代为刻成《蕃锦集》二卷。康熙十八年(1679)龚翔麟刻《浙西六家词》,其中有朱彝尊《江湖载酒集》三卷。其去世前后刻《曝书亭集》,其中有词

<sup>①</sup>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集部》“前言”,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册,第4页。

<sup>②</sup> 关于《中国古籍总目》之词集著录,参见拙文《〈中国古籍总目〉词籍类斟议》,《文学遗产》2020年第1期。

七卷，一般称作《曝书亭词》，其中包括《江湖载酒集》三卷、《静志居琴趣》一卷、《茶烟阁体物集》二卷、《蕃锦集》一卷。另有少作《眉匠词》一种。故朱彝尊名下，《曝书亭词》与五种小集各为一种，共计六种。

3. 一集多本者，仍视作一种。如吴伟业《梅村诗余》二卷，有康熙间刻《梅村集》本，孙默辑刻《国朝名家诗余》本，乾嘉间刻《吴诗集览》中靳荣藩注本，程穆衡笺、杨学沆补注《梅村诗余笺注》本等，均视作一种词别集。

## (二) 总集、丛编中的别集认定

1. 合编词集，凡各家词独立成卷者，各视为一种别集。如《幽兰草》为陈子龙、李雯、宋征舆三人词合集，共三卷，人各一卷。卷上收李雯词42首，卷中收陈子龙词55首，卷下收宋征舆词48首。版心下分别刻有三人的堂号，李雯是“仿佛楼”，陈子龙是“江蓠槛”，宋征舆是“凤想楼”。一般即以其堂号为词集名。又如《支机集》，为蒋平阶与其弟子周积贤、沈亿年三人词合集，共三卷，人各一卷，今有《惜阴堂汇刻明词》本。虽然各人词卷并无词集专名，但仍应以别集视之。《知见目录》之所以收录部分总集，即出于这种考虑。

2. 家集，凡各家词独立成卷者，各视为一种别集。如乾隆二年（1737）盛熙祚汇编盛氏三兄弟词集为《棣华乐府》，其中包括盛枫《梨雨选声》二卷、盛禾《稼村填词》二卷、盛本柘《滴露堂小品》二卷。盛氏三兄弟词集目前未见其他传本，故各以词别集视之。家集中也有比较特殊的个案，如乾嘉时期杭州文人钱东、钱锡宾等辑《湖墅钱氏家集》，收录钱东《双桥书屋遗稿》二卷。其中《双桥书屋遗诗》一卷，收诗14首；《双桥书屋词存》一卷，存词仅1首。该集有光绪二十二年（1896）刻本，南京图书馆有藏本。《中国丛书综录》《知见目录》均有著录。虽然只有1首词，但因为清刻本既有集名又独立成卷，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一种清词别集。

3. 唱和集，凡各家词独立成卷者，各视为一种别集。此与一般合集不同的地方，在于诸家词为同调或同题唱和。如顺治四年（1647）暮春，陈子龙、宋存标、宋征璧、宋征舆、钱谷、宋思玉等云间词人相与唱和，其作品后来由宋征璧结集为《倡和诗余》六卷，人各一卷，即宋存标《秋士香词》一卷、宋征璧《歌浦倡和香词》一卷、宋征舆《海间倡和香词》一卷、钱谷《倡和香词》一卷、陈子龙《湘真阁存稿》一卷、宋思玉《棣萼轩词》一卷。此集刊于顺治七年（1650），诸家词既各为一卷，又各有词集专名，当然可视为各自独立的别集。

4. 词集丛编，凡各家词独立成卷者，各视为一种别集。如聂先、曾王孙辑《百名家词钞》（一作《名家词钞》），孙默辑《国朝名家诗余》，徐乃昌辑《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等，皆为各家独立成卷，因此都应以别集视之。

5. 部分选本名为词选，实同丛刻。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侯晰序刻《梁溪词选》，浙江图书馆藏康熙间醉书关刻本为二十一卷，除去《中秋倡和词》一卷，实收无锡词人二十家，人各一卷，亦各有词集名，故可以词别集视之。

丛编或选本中有一些特殊情况，或有讨论的必要。如孔传铎辑《名家词钞六十种》，共选清代顺康时期词人六十家，人各一卷，但实际收词多寡悬殊。其中不少词家选词只有一两首或三五首，亦皆号称一卷。如只选一首的有黄云、黄泰来、倪灿、徐乾学、黄承圣、朱一是、丁濬、方正璠、杨斐菴等9家，仅选两首的有陈见智、徐昌薇2家，仅选三首的有许承钦、王鸿绪、潘云赤3家。60家中选词不足十首的多达32家。像这样的情况，视作别集或许会引起质疑。但我们认为，既然独立成卷，又各有集名，不论其存词多少，皆当以别集视之。而且孔传铎《名家词钞》编于康熙、雍正时期，彼时皆已称集称卷，可见已是既成事实，今天也就没有质疑的必要了。况且，这种情况在词集丛编中多有其例。如赵尊岳辑录《明词汇刊》，号称收录明词别集253家257种，但其中原本成集单行者较少，多数是从各人诗文别集中析出其词而别题集名的，故而各人名下存词多寡不一。其中仅存一首词的有9

家，仅存两首词的有13家，存词不足十首的有105家，而存词超过五十首的仅有37家，但在集中皆以人分卷。王兆鹏《词学史料学》述及明词，除刘基、瞿佑等单行别集俱在者之外，举凡小家别集，亦皆引《明词汇刊》为据，意味着这种总集或丛编中的别集，已经得到学界认可。

关于总集或选本中词别集之判定，既成的凡例也有可能遭到挑战。例如清代乾隆时词人沈光裕（生卒年不详）著有《拂云书屋词》，今不传。乾隆间蒋重光辑《昭代词选》，沈光裕与张玉谷共为参定之。该选卷三〇、卷三一选沈光裕词多达147首，这些词与《拂云书屋词》是何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与沈光裕共同编选《昭代词选》的张玉谷，有《乐圃吟钞》八卷，其后四卷为词，存词206首。而《昭代词选》卷三四、卷三五选录张玉谷词225首，比《乐圃吟钞》后四卷所收词的总量还要多。可知张玉谷基本是把《乐圃吟钞》中的词，全部迳录到《昭代词选》中来了。以张玉谷之例推想，《昭代词选》卷三〇、卷三一所选沈光裕词147首，应该也基本是其《拂云书屋词》之全部，虽然《知见目录》未著录，仍当以别集视之。

### （三）诗文别集中的词别集认定

清人词作，除单行词集外，多附于诗文集之后。其编排各有不同，既有分体或编年之别，亦有混编与独立之分。《全清词》各卷于诗文别集附词，指称亦未尽统一：有时称有某集附词一卷，有时则因诗文别集之名而径称有某某词。事实上，本文认定清词别集时，主要关注的就是诗文别集附词所带来的纷繁现象；而关于存世清词别集数量之出入，亦与由此带来的统计口径之差异有关。

关于诗文别集附词之词别集的界定，试明确以下三条标准：

1. 诗文别集附词，凡独立成卷者，即可视为词别集。如刘命清有《虎溪渔叟集》十八卷，卷八为“诗余”；薛敬孟有《击铁集》十卷，末卷为“诗余”；赵进美有《清止阁集》九卷，末卷为“诗余”；高层云有《改虫斋诗略》九卷，末卷为词；彭师度有《彭省庐先生诗集》十卷，末卷为“诗余”。如此之类，皆可以词别集视之。至于词集名，按惯例则因其诗文别集而名之，至于或称“诗余”，或称“词”，则一本其旧。如赵进美词可称《清止阁诗余》，高层云词则称《改虫斋词》。

与此相应，诗文别集附词，如非独立成卷，则不视为词别集。《知见目录》卷首“述例”有云：“本书所收作品，以别集为原则，唯古人诗文集之后往往附词若干阙，此类作品泰半未见著录，非检原书不易觅得，故兼采并收；唯零星数首不成卷者，则不收。”（第XIX页）此条即谓“不成卷者”则不视为词别集，与本文主张相同。如王永积有清刻本《心远堂遗集》二十卷，末卷有“诗余”4首；彭而述有《读史亭诗集》十六卷，末卷有“诗余”10首；李霁有《心远堂诗集》十二卷，末附“诗余”13首；徐履忱有《耕读草堂诗钞》十五卷，按年编排，有词28首，各附于相应年份诗后。如此之类，皆非独立成卷，即便达到一定数量，甚至比某些单行词集中的收词还多，但限于体例，仍不作词别集看待。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对于诗文别集附词，以是否独立成卷作为判定词别集的标准，《知见目录》亦有未尽统一之处。如乔于澗有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本《思居堂集》十三卷，其中诗十卷，卷一〇诗后附词，目录标“诗余二十九首”，实际存词32首。此亦非独立成卷，故不应视为别集，但《知见目录》著录为《思居堂诗余》一卷。或以其虽不成卷而“非零星数首”者乎？若以数量为标准，则又易滋淆乱，因为这种数量的标准很难确定。同样，汪栋《澹虑堂遗稿》四卷，诗后附词10首；陈梦雷《松鹤山房集》二十九卷，凡诗集九卷，卷九附“诗余”“杂曲”（其中词十四首）；谢道承《小兰陔诗集》八卷，末卷附词6首；唐英诗文集《陶人心语》五卷，卷四诗后附“诗余”13首：这些均非独立成卷，不应视为别集，但《知见目录》皆著录作有词一卷。这也许是因为参与采集资料信息者众多，故虽有标准而未能贯彻到底，然而在对清词别集进行系统清理的过程中，仍应坚持以是否独立成卷作为判定词别集的标准。

2. 诗文别集中的词不仅自成卷帙且有专名，自然应以词别集视之。如冯云骧有《讷生诗集》六

卷，末卷为词集《寒山吟》；周金然有《广庵集》八十三卷，其中有《南浦词》三卷；刘榛有《虚直堂文集》二十四卷，末卷为《董园词》；释大汕有《离六堂诗集》十二卷，末卷为《绘空词》；嵇宗孟有《立命堂二集》十三卷，其中有词集曰《酒骨董》。如此之类，皆应以词别集视之。

3. 诗文别集中的词，不仅自成卷帙，且有词集序跋，自然应以词别集视之。如安致远有《安静子集》十五卷，其中有词集《吴江旅啸》一卷，该卷卷首有济南葛元福康熙六年序；钮琇有《临野堂集》，其中有“诗余”二卷，钮琇有《临野堂诗余自序》；汪观有《静远堂诗集》七卷，末附《梦香词》一卷，汪鹤孙、姜实节、汪灏、汪泂、汪绎诸家有《梦香词序》。此种情况，虽非单行，但已近乎典型的词别集形态，故无须讨论。

(四) 文体杂糅者的词别集认定。有些单行著作，词与诗文相与俱来，共生共处，其体例介于诗、文、笔记诸体之间，文体属性模糊。对于这样的著作，可以从宽认定。如邹枢《十美词纪》，记述明季美貌女子十人，多为秦淮名妓。每人先以散文叙事，后系以咏赞之词。既以“词纪”题名，或可从宽作词别集看待。又如赵执信《海鸥小谱》，记诸妓色艺及赠妓词凡9首，亦可作如是观。赵执信放废之余，聊借醇酒妇人，销磨壮心，此与当年温八叉、柳三变情事相近，故于颓唐放旷之下，正见词之本色，既与狭邪荡子有别，亦远离修齐治平之堂皇庄语，无意求工而自有风味。张宏生教授近年辑《清词珍本丛刊》，亦收入《海鸥小谱》，看来也是将其作为词别集看待的。

### 三 清词别集总目订补

如今我们从事清词别集总目的订补工作，自然应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拾遗补缺。而当下最权威的基础文本仍然是吴熊和、严迪昌、林玫仪三位先生合编的《知见目录》。这部专科目录对于词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对于清词研究者来说尤为为不可或缺的案头工具书。但是限于课题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当下的文献条件，对现存清词别集总目作进一步的探寻考证，并且不得不对该书目作必要订补，这是非常令我不安的事。三位先生中，严迪昌先生是我的恩师；吴熊和先生亦是我的“座师”，我1997年博士论文答辩时，吴先生对我的论文作了十分精到深刻的评价；林玫仪先生亦对我多有关照，而且不辞烦难，为我全文复制了台北“中央图书馆”所藏张缜《诗余图谱》的嘉靖十五年（1536）初刻本。这些都令我永远难忘。但我想，对《知见目录》存在的个别疏误之处加以讨论，正是学术事业薪火相传的体现，与我对诸位先生的真挚感情应该是不矛盾的。

近年来，我在《知见目录》的基础上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曰芟误，即芟除个别误收词集或非严格意义的清词别集；二曰整合，即化版本目录为词集目录，将同一词集的不同版本合为一种；三曰补遗，即在原有词集目录的基础上拾遗补缺。

#### (一) 芟误

《知见目录》误收词集，可以分为以下五种情况：

一是误收非清人词集。如杨文斌辑《三李词》三卷（编号0103），收录李白、李煜、李清照三家词。虽然编者杨文斌是清代人，但“三李”并非清人。又如编号0370著录：“文溪集诗余二卷，李昂英撰，道光二十年诗雪轩刊粤十三家集文溪集本。”（《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见存书目》，第16页）《粤十三家集》为清人伍元薇所编，收录宋代至清代广东文人诗文别集共13家。第一家即李昂英《文溪集》二十卷，其中有“诗余”二卷。根据书后伍元薇跋，可知李昂英为宋人无疑，但此书收藏单位将其误著录为清人著作，编录时未能发现。又如编号3151著录：“昆山顾桂轩先生啖蔗余甘词一卷，顾恂撰，钞本。”（《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见存书目》，第134页）顾恂（1418—1505），字惟诚，号桂轩，昆山（今属江苏）人，有《桂轩集》《鳌峰集》等。顾氏后人顾登辑《玉峰雍里顾氏六世诗文集》，于雍正十年（1732）刊行，收入《啖蔗余甘词》一卷，存词138首，《全明词》据录。

二是误收清人非词之集。如编号 1771、1772 著录张云璈《金牛湖渔唱》一卷，为竹枝词专集，并非词集。又如编号 3166 著录：“从心录一卷，潘炤撰，嘉庆十一年小百尺楼刻钩渭间杂脍本。”（《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见存书目》，第 135 页）潘炤字鸾坡，号桃源渔者，江苏吴江人。《从心录》收录《鸾坡居士红楼梦词》三十二首、《温柔乡词十八章》、《曲儿头诗三十首》、《又曲儿头诗十首》、《闲情偶赋》、《京都杂咏》、《耆英下会图记》、《赠枕泉上人》（柏梁体百有八韵）、单折戏曲《千秋岁庆寿》，包含诗、文、赋、曲，但唯独没有词。《鸾坡居士红楼梦词》其实是七律，《温柔乡词十八章》则是七绝，都不是词。

三是所收非严格意义的清词别集。《知见目录》卷首《述例》云：“本书所收作品，以别集为原则，唯古人诗文集之后往往附词若干阙，此类作品泰半未见著录，非检阅原书不易觅得，故兼采并收；唯零星数首不成卷者，则不收。”（第 XIX 页）但这一体例未能贯彻始终。如编号 3300 著录钱蕙生《梅花阁遗诗》一卷，该集附刻于张金镛《躬厚堂集》之后，诗后附词二首，即不宜视为词别集。此正属于所谓“零星数首不成卷者”，故不当收。前文述及之乔于泐《思居堂集》附词，汪栋《澹虑堂遗稿》诗后附词，陈梦雷《松鹤山房集》附“诗余”，谢道承《小兰陔诗集》末卷附词，唐英诗文别集《陶人心语》附“诗余”，亦属此类。另如编号 4192 著录“徐钊撰”《枫江渔父图题词》一卷，亦有未妥。康熙十四年（1675），徐钊曾请钱塘著名画家谢彬绘《枫江渔父图》，以寓终老江湖之意。图成后广征题咏，先后得作者 92 人，诗、词、曲、文共计 137 首<sup>①</sup>。因为不是徐钊个人所作，故非别集；且题词中各体皆有，亦非词集，如其中洪昇所作《北中吕·粉蝶儿·题徐虹亭枫江渔父图》，就是由十支曲子组成的散曲套数。

四是书中附录之合集、选集。清人词集，每合数种为一集，其性质介于选本与丛刻之间，如《百名家词钞》《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之类，然其中子目亦颇有单独梓行者。为避免疏漏，《知见录》中收入合集或丛编之类凡 159 种，且子目、总目合并排序。为与其他别集有所分别，相关书目前加“△”以示区别。这种宁多毋漏、巨细无遗的良苦用心是可以理解的，但考虑到总集、别集之分，这 159 种词集中有 96 种为个人词合集，如朱彝尊《曝书亭词》、郑文焯《大鹤山房全书》之类，可以视为别集；而另外如《百名家词钞》等总集凡 63 种，列入附录没有问题，但在统计清人别集时则不宜计入。

五是因文字缺讹而致重复著录。如编号 0378 著录的张模《月秋词》，与编号 0003 著录的《一月秋词》同为一书，均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因缺“一”字而误作二书<sup>②</sup>。又如王嘉福《二波轩词选》，前有编号 0045 著录的道光十四年（1834）刊二卷本，编号 0046 著录的道光十七年（1837）刊四卷本，至于编号 0047 著录的道光刊四卷本应与编号 0046 所著录者系同一版本；而后面又有编号 1605 著录的王嘉福《波轩词选》三卷。王嘉福，字谷之，号二波，为王芑孙次子，著有《二波诗稿》等。《波轩词选》应该就是《二波轩词选》，因缺“二”字而误作二书。又如编号 3976 著录的管贻荪《词草》一卷，实即编号 3701 著录的《湘雨斋词草》一卷。此为清同治五年（1866）管氏刻本，诗、词合刻，前为《裁物象斋诗钞》一卷，后为《湘雨斋词草》一卷。又如编号 3105 著录“问琴阁词一卷，宋育仁撰，清刻本，（南师大）”（《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见存书目》，第 132 页），编号 4716 著录“闻琴阁词一卷，宋育仁撰，清刻本，（北师大）”（《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见存书目》，第 200 页），虽然藏书单位有别，“闻”“问”有异，实际应是同一种词集。按：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四川富顺人，著有《问琴阁文录》《问琴阁诗录》。李谊辑校《历代蜀词全辑》，收入朱德宝《百字令·题宋芸子问琴阁词卷》。诸说相较，可知当以《问琴阁词》为是，《闻琴阁词》之“闻”字乃形近致误。又如编号 3551 著录的胡成浚《雪眉词钞》一卷，与编号 4022 著录

① 参见游国恩《跋洪昇〈枫江渔父图题词〉》，《文学评论》1962 年第 1 期。

② 张模有《一月秋词序》，参见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凤凰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 册，第 623 页。

的胡成浚《云眉词钞》一卷，实际为同一词集的另一版本。胡成浚，字在郊，号雪眉，安徽黟县人，著有《雪眉诗钞》四卷，其中《诗钞》三卷，《词钞》一卷。同里汪焘《梨花斋词影》中有《满庭芳·题胡雪眉〈翠雪楼词稿〉》，孙学道《笠人诗稿》有《培筠园双桧歌和胡雪眉作》，故知当作《雪眉词钞》，“云（雲）眉”乃形近之误。

### （二）整合

整合，即在《知见目录》著录的清词别集版本基础上，将不同版本进行删并，即将一集多本仍作一种计算。《知见目录》著录清词别集 2382 家，而著录词集版本条目达 6276 种，其中除一人多集的因素外，更多属于一集多本。如吴伟业《梅村词》著录 19 种版本，彭孙遹《延露词》著录 13 种版本，王士禛《衍波词》著录 19 种版本，顾贞观《弹指词》著录 22 种版本，纳兰性德《纳兰词》著录 12 种版本，《饮水词》著录 24 种版本。这种情况在一人多集的朱彝尊身上体现较为典型。朱彝尊《江湖载酒集》有 16 种版本，《茶烟阁体物集》有 10 种版本，《蕃锦集》有 13 种版本，《静志居琴趣》有 10 种版本，《曝书亭词》连同拾遗等共有 28 种版本，这样即使不包括学界有不同看法的少作《眉匠词》，朱彝尊的五种词集版本已多达 77 种。经过逐人逐集的具体统计，《知见目录》6276 种版本信息中，不同版本条目凡 3009 种。一旦删并这些重复的版本条目，现存清词别集的数量就大致可知了。

另外顺便说一下，无论是《知见目录》还是《中国古籍总目》词籍类的著录，都是建立在各地公私藏书调查基础之上的，而各地图书馆在判断版刻年代时往往有出入。如查为仁《押帘词》，著录有三个版本。编号 1472 著录：“押帘词一卷，查为仁撰，乾隆八年精刊初印蔗塘未定稿本。”编号 1473 著录：“押帘词一卷，查为仁撰，乾隆八年刊蔗塘未定稿本。”编号 1474 著录：“押帘词一卷，查为仁撰，乾隆八年宛平查氏写刊蔗塘未定稿本。”（第 64 页）黄裳《榆下说书》“清刻之美”条，曾专门举“宛平查为仁的《蔗糖未定稿》的开花纸印本”为例，认为“可以作为乾隆中精写刻本的代表”<sup>①</sup>；后来见到陈皋的手稿《沾上醉里谣》，才断定查为仁的《蔗糖未定稿》以及汪沆的《津门杂事诗》，都是由陈皋手写上板的。虽然各藏书单位在描述版本信息时不无小异，但这个同为乾隆八年（1743）写刊的《蔗糖未定稿》显然系同一版本。又如陶维垣《叩拙词》，乾隆三十七年（1772）编定，书名取陶渊明“叩门拙言词”之意。自序作于“乾隆壬辰大寒前一日”，但生前并未刊行。陶维垣卒后，其子陶钦、陶钺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十九年（1784）先后征得吴树珠序、陆溶序，于嘉庆二十年（1815）刊行传世。《知见目录》著录二本，编号 0561 国家图书馆藏本著录作“乾隆刻本”，编号 0560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本据其自序时间定为“乾隆三十七年刻本”，均误。而这种仅据序跋撰写时间来判断版刻年代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 （三）补遗

《知见目录》未收或失收词集，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

一是诗文别集附词。如梁云构《豹陵集》明刻本、清刻本各有“诗余”一卷；刘命清《虎溪渔叟集》卷八为“诗余”；宫伟鏐《春雨草堂集》有“诗余”一卷；薛敬孟《击铁集》十卷，末卷为“诗余”；曹章《观澜堂集》十七卷，卷九为“诗余”；彭师度《彭省庐先生诗集》十卷，末卷为“诗余”；沙张白《定峰诗钞》十三卷，末卷为“诗余”；闵奕仕《载云舫诗集》十卷，末卷为“诗余”；孙在中《大雅堂集》十卷，后二卷为“诗余”；段昕《皆山堂诗草》十卷，末卷为“诗余偶成稿”。按照通行体例，这些诗文别集中的词都是独立成卷的，有的另有词集名或词集序，皆应以词别集看待。

二是较为罕见的稿本、清钞本。如仲恒《雪亭词》十六卷、林时跃《朋鹤草堂集》附词一卷、周斯盛《证山堂诗余》五卷、齐召南《瑞竹堂词》一卷、姚宗璜《松下梦余词》一卷、缪永谋《南枝词》三卷、罗文颀《半山园词》三卷、钱牧《西畴草堂诗余》一卷等，均为较罕见的稿本。徐增《九

<sup>①</sup> 黄裳《榆下说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3 页。

诰堂集》附词一卷、孙炯《华黍庄集》附“诗余”一卷、袁藩《敦好堂诗集》附词一卷、宫鸿历《墨华词》一卷、杨在浦《碧江诗余》一卷、邹稷《艺苑词钞》一卷、李饮冰《涧琴词学》一卷等，均为清钞本。稿本、钞本遗漏略多，应是因为各图书馆对这类珍稀古籍较为看重，故往往单独造册著录，所以《知见目录》编者当年如此用心寻访，仍有未及。

除以上两种情况外，还有一些词集失收的原因值得引为借鉴。如《知见录》漏收了侯文灯《回雪词》一卷、蔡灿《容与词》一卷、华文炳《菰月词》一卷、顾彩《鹤边词》一卷。这四种词集全部出于康熙间无锡词人侯晰编录的一部总集《梁溪词选》，因为该词选中所选各家人各一卷，所以说它是词集丛刻亦无可。问题在于《知见录》中收录了《梁溪词选》中其他 20 家的词集以及《中秋唱和词》一卷，还具体开列了各集的子目，那又为何会遗漏这四种词集呢？原因在于，《梁溪词选》有多种版本，而不同版本所收词集互有出入。《知见目录》编者只检录了浙江省图书馆所藏康熙间醉书关刻《梁溪词选》二十一卷本，而侯文灯《回雪词》一卷见于上海图书馆所藏另一刻本，此本亦为醉书关刻本，却只有八家八卷。而蔡灿《容与词》一卷、华文炳《菰月词》一卷和顾彩《鹤边词》一卷，则见于上海图书馆藏民国云轮阁钞本。可知同一种词集的不同版本差异甚大，须经目验比对才能避免出错。至于清初的《倡和诗余》六卷，在“附录一”介绍各合集子目时并无遗缺，但在书中却找不到钱谷的《倡和香词》一卷，这应该是出于疏漏，而非其他特殊原因。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对传世的清词别集作一个基本测算了。《知见目录》共收版本条目 6276 种，去掉误收词集 5 种、非严格意义清词别集 7 种、重复著录 5 种、兼收合集或丛编 63 种，再减去不同版本 3009 种，还有 3187 种。这就是《知见目录》著录的清词别集的实际数量。虽然手工统计会略有出入，但不会有颠覆性变化。另外根据目前笔者对《知见目录》未收词别集的辑补情况，预测整个清代应能辑补词别集 500 种左右，则存世清词别集当在 3700 种左右。

[作者简介] 张仲谋，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清代文化与浙派诗》等。

(责任编辑 马 昕)